

編號：(93)091.212

中國經濟的奇蹟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民國 93 年 12 月

GPN : 1009305286
定價 : 80 元
平裝

中
國
經
濟
的
奇
蹟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編號：(93)091.212

GPN：1009305286

中國經濟的奇蹟

委託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計畫主持人：張清溪

(本報告內容純係作者個人之觀點，不應引申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之意見)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民國 93 年 12 月

中國經濟的奇蹟/張清溪計畫主持. —初版. —台北

市：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民 93

面：表，公分

委託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GPN 1009305286

平裝

1. 中國經濟

552.287

題名：中國經濟的奇蹟

委託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計畫主持人：張清溪

出版機關：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電話：02-23165300

地址：臺北市寶慶路 3 號

網址：<http://www.cepd.gov.tw/>

出版年月：中華民國 93 年 12 月 版次：第 1 版 刷次：第 1 刷

GPN：1009305286

定價：80 元(平裝)

中國經濟的奇蹟

張清溪

台大經濟系

2004 年 12 月

摘要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成長快速、外資擁入、出口激增、外匯存底世界第二，號稱世界工廠，有人稱此為「中國經濟奇蹟」。錯了！中國經濟真正的奇蹟，不是它的成長快速，而是這個充滿矛盾與問題的經濟體，居然還沒有崩潰。本文分析中國經濟問題及其根源，以及問題叢生竟未崩潰的理由，最後說明這個奇蹟不可能持久，並論台灣的因應之道。

目錄

前言	-----	1
第一部份 中國經濟的亮麗表相	-----	2
第二部份 中國經濟根基腐蝕的真相	-----	5
第三部份 經濟根基腐蝕的制度因素	-----	15
第四部份 解決無望	-----	20
第五部份 中國經濟奇蹟：為什麼還沒崩潰	-----	26
結論 奇蹟不可能持久	-----	28
參考文獻	-----	31

中國經濟的奇蹟

● 論一個該倒而未倒經濟的真象 ●

張清溪

前言

中國自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成長快速。一般人稱此為中國經濟成長奇蹟。但是，就以它百分之十的平均成長率而言，如果扣掉「水份」，可能還比不上日本與東亞四小龍在二次戰後四十年的成長率。因此稱不上奇蹟。但是有一個真正的中國經濟奇蹟，是它根基腐蝕又遍體鱗傷，不但沒有崩潰，還活得表面上光鮮亮麗。本文就是要分析這個真正的中國經濟奇蹟。

近年來有關中國經濟相關研究相當多，國內外發表與出版的刊物或專著，包括非經濟科班者的著作，都有很多可供參考之處。這些著作對中國經濟的看法，卻南轅北轍。有人稱中國是世界工廠（黑田篤郎 2001）、前景樂觀（傅豐誠 2003）或明日之星（大前研一 2002），有人則直指中國即將崩潰（如章家敦 2002；張清溪 2004）。

但是，即使最樂觀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問題叢生、危機四伏。他們不同的地方，在於中共能否克服這些問題。我們認為，中國經濟成長不但造假成份很大，而真正「成長」時，又非常擔心「經濟過熱」，形成冷熱不宜的困境。與此同時，包括金融呆帳、國企虧損、失業嚴重、貧富懸殊、吏治腐敗、生態惡化與道德敗壞等等，都達到驚人的程度。那為何中共政權還能維繫？經濟照常發展？社會仍能運作？這個真正的中國經濟奇蹟，是本研究分析的主體。本研究將從文獻檢討與資料研判中，提出這個中國經濟奇蹟的來源與未來展望。

以下分成四部分討論這個中國經濟奇蹟：第一部分描述中國經濟的亮麗表相；第二部分討論它根基腐蝕的真象；第三部分試圖解釋這些問題的根源；第四部分進一步分析中共無法解開這些問題；第五部分探討為何這樣的經濟竟然不會崩潰。最後結語，提出台灣面對這樣局面的因應之道。

第一部分 / 中國經濟的亮麗表相

自從七十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令人矚目的。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多年來，中國經濟以接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根據華盛頓的智囊機構 Cato Institute 的統計，按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目前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它所吸引的外資在全世界也首屈一指。與此同時，中國也變成了世界工廠，印著「中國製造」標籤的產品源源不斷地流向地球的各個角落。以下我們從五個方面來自中國亮麗的表現：(1) 經濟成長有擋不住的感覺；(2) 外資湧入，前仆後繼，世界工廠，外資樂園；(3) 國際貿易成長快速；(4) 外匯存底世界第二；(5) 影響力大，與列強爭鋒。

1. 經濟成長: 擋不住的感覺

自從 1978 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歷經二十年的快速經濟成長。中間雖然經過 1989 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但延宕不久，成長重新上路。1999 年以後，或更正確的說，從 1997 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後，中國仍然表現「亮麗」，並成為一枝獨秀的世界奇葩。2001 年，幾個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相繼跌倒，經濟負成長，中國仍然「七上八下」（意即成長率在 7% 以上、8% 以下）的一路長紅。

2002 年十月中國國務院經濟研究室在一個內部研討會上，提出報告：當前經濟形勢，是改革開放以來，相對最穩定、最健康的。現已進入持續發展時期。在可見的十年至十五年，只要國際局勢不發生大的變化，大方針不發生大的失誤，中國經濟發展不僅能保持 7~10% 的年成長，而且在 2015 年，國民經濟綜合實力會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可達歐盟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峻宏 2002）。

2003 年春 SARS（嚴重急性吸呼道症候群）攻擊中國，在掩蓋無效後，中國陷入困境，外商卻步。但縱使如此，該年經濟成長率仍然高達 9.1%。2004 年上半年，經濟成長率再創新高，達到 9.3%。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已經由七上八下，進化為「八九不離十」。

2. 外資湧入: 前仆後繼，外資樂園

從 1985 至 2003 年，到中國的直接外人投資 (FDI)，累計有 4,950 億美元。在 1985 年，FDI 只佔 GDP 的 0.54% 以及固定資本形成的 1.34%；但在十年後的 1995 年，這個比例已經分別上升到十倍的 5.4%、以及八倍的 11%。在 1997 年，又分別上升到 5.02% 和 10.53%。以後約維持在這個比例。

儘管經歷中國優待外資、行政配合高效率的人，很多認為中國簡直是投資者樂園。但到中國投資馬失前蹄或陰溝裡翻船的跨國企業或台商都不少見（如見高為邦 2002；林志昇 2002；Studwell 2002）。2004 年 11 月中旬，Merrill Lynch 證券公司公布一份調查，顯示家電與零售的跨國企業要在國賺錢「很難」；電腦業則面臨無法遏止的盜版歪風。雖然如此，外商仍然前仆後繼、不絕如縷。特別在 2002 年中國正式加入 WTO，又引發另一波蜂擁而入的外資，甚至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 FDI 吸收國。

外資對中國的貢獻特別大。直接外人投資可以帶來技術與就業，因此受到各種發展階段國家的歡迎。不止如此，外資還帶來資金，對已被外商經濟顧問公司宣告破產的中國國營銀行，無異是續命丹。

3. 國際貿易：世界工廠

由於工資便宜，環保要求低，行政配合度高，中國已成為製造業大國的「世界工廠」，每年對對輸出許多 Made in China 的商品（黑田篤郎 2002）。目前中國每年出口 600 億美元的產品，價格極具有競爭性，被稱為「中國價格」，令歐美產業界聞之色變，有些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大約百分之七十的中國出口產品，是台灣、香港、日本和美國等外資公司在中國大陸投資工廠的產品。

2003 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達 1,240 億美元，估計 2004 年的美中貿易的美國逆差將接近 2,000 億美元。歐洲統計局 2004 年 12 月初表示，中國已躍升為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在 1999 年至 2003 年之間，貿易總額迅速增為二倍，且大都是逆差。由於中國製造業的大量出口，出超數額龐大，造成它與歐美國家的貿易攻防戰。由於中國政府干涉經濟的普遍存在，歐美都不給中國在 WTO 架構下的「市場經濟」承認，在紡織品等製造業上對中國課以「傾銷稅」，引發貿易戰。

台灣在 2003 年出口中，有 34% 到中國；中國已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對象，超過日本與美國。

4. 外匯存底：世界第二

由於外資的增加與出口的旺盛，中國 2003 年底的外匯存底為 4,033 億美元。截至 2004 年 9 月底，累積至 5,145 億美元，超過台灣（2,030 億美元），僅次於日本（8,112 億美元），居世界第二。

5. 影響力大：帶動世界價格，與美日爭峰

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在經濟上，由於政府主導許多建設，政治干預的結果，動輒造成世界的物價波動。例如，由於中國消費了全球鋼材的 30%，在中國盲目投資以及隨後的「降溫」命令之間，2004 年上半年熱軋鋼捲每噸價格，竟然在 350 美元至 670 美元間起伏。中國大量進口大宗穀物，如大豆、玉米與小麥等產品，國際價格也是波動不已；例如，2004 年 3 月芝加哥黃豆期貨飆升至每公噸 460 美元，到 6 月就降到 357 美元。水泥、玻璃、石化、橡膠、鋁等，也都有類似情況。

台灣一直擔心傳統產業外移到中國，造成所謂「產業空洞化」。其實，根據美國 *Business Week* (2004.12.6) 的專題報導，“The China Price”也成為美國企業家談虎色變的名詞，除了傳統的紡織品、服裝、鞋類、電器和塑膠產品當然不敵「中國製」，連大塊頭的臥房家具、科技的網路產品或小如螺絲等等，都經不住中國報價的競爭。IBM 把個人電腦業務出售給中國聯想集團，等於是整廠業務外包。

此外，2003 年成功發射載人太空船神舟五號；2004 年奧運中國獲得第二多的獎牌；中國並將在北京主辦 2008 年奧運，以及 2010 年在上海的世界博覽會。它還將建造世界最高的鐵路(通往西藏)、有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峽大壩)。

在軍事上，中國也與美、日爭鋒。擴張軍事，向俄羅斯、烏克蘭等大肆採購武器。在經濟上則援助開發中國家，欲稱霸第三世界，因此雖然面對強國、世界銀行時，扮演窮國，要求援助；但對第三世界則扮演富國，出手大方，例如 2004 年胡錦濤訪問阿根廷時，許諾經援 200 億美元；過去中國幫許多國家蓋體育場，其中薩依的體育場可容納八萬人，其等級之高、施工之精良，比美北京的工人體育場（何清漣 2004e）。

第二部分 / 中國經濟根基腐蝕的真相

對於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國際上，國際上通常有兩種反應。一種是非理性的誇大了中國經濟前景（如大前研一 2002），導致外資急於抓住與中國企業合資的機會，而不顧實際風險；另一種則是高估中國經濟的成就與發展潛力，使「中國威脅論」的呼聲越來越高（如 Shenkar 2004）。

但是，這兩種反應都是錯誤的，因為它們都忽略了中國經濟「奇蹟」背後的嚴重不足，也就是不知道中國經濟真正的奇蹟。

1. 成長真象之一：造假

中國的假帳愈演愈烈。一九九七年以後的數字，其造假已經太離譜，完全不被中國經濟專家接受。

匹茲堡大學教授 Thomas Rawski (2002) 認為，1998 年以後中共公布的經濟成長率難以令人信服。理由很簡單，像中國這樣落後而快速發展的國家，不可能一邊快速成長 (1997~2000 之間，GDP 累計成長了 24.7%)，而同時期的能源使用量卻減少 (負成長 12.8%)，民航客運量、公路貨運量、鐵路貨運量成長率都低於 GDP 成長率，而且物價下跌、失業增加。根據他的估計，中國經濟成長率在 1998~1999 兩年各約在正 2% 與負 2% 之間，2000 年約 2~3%，2001 年也只有 3~4% 而已。

Rawski 以能源使用推論國民產品，很容易找到支持的數據。媒體報導（《大紀元網》2004.3.5），北京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牛文元表示，中國二十多年來盛行的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擴張型經濟增長方式，使得能源浪費大、環境破壞嚴重等問題日益凸顯。他說，中國每創造 1 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 4.3 倍，德國和法國的 7.7 倍，日本的 11.5 倍。

中共有說假話、大話、空話的傳統，過去就有一邊「畝產萬千」的向全國報喜，一邊餓殍遍野的情形。現在拜電子媒體之賜，「假大空」話傳遍世界變成世界笑話。各省彙報國民產值到中央時，北京的中國國家統計局不敢直接使用各省彙報資料。因此造成國家網站上公佈的各省成長率，以 2001 年為例，除了雲南省之外，都高於全國值（而全國值應該是各省的加權平均）！

統計局有鑒於地方的「假報浮誇風」，2001 年 5 至 10 月進行一項調查，竟發現有 62,000 多件統計造假舞弊。其實這種造假風氣存在已久，而統計局的調查與處罰，不但不能遏止「假報浮誇風」，而且變本加厲。以後各年，無一例外的，各省 GDP 成長率都高於全國成長率。以 2004 年上半年為例，中央公佈全國的 GDP 是 58,773 億人民幣；但由全國三十一個省市自治區同一時期的 GDP

總和，卻是 70,273 億，比北京公佈的多出五分之一；各省市自治區的 GDP 增幅，均是雙位數，平均高達 13.4%，比北京公佈的 9.7%，高出 3.7 個百分點。¹

為了避免再開這種國際笑話，二〇〇四年底，國家統計局發佈新規：從二〇〇五年起，各省不得再自行發佈 GDP 數據，改由國家統計局統一發佈。以總理溫家寶為首的中國國務院，宣布要舉辦全國經濟普查，正式向各地 GDP 浮誇風宣戰。不過，媒體對這項「改革」多存悲觀，預期有關工作的開展一定會遭遇地方千方百計的阻撓，工作人員可能要冒著生命危險執行。《亞洲時報》(2004.12.22)報導說，過去中央工作組進駐地方辦公，經常都會遭遇地方官員企圖行賄甚至加以恫嚇的情節。2000 年，中紀委在中國廣東汕頭迎賓館調查當地稅務走私大案時，更發生一場神秘火警，導致五名中紀委查案官員死亡的事件。

2. 成長真象之二：過熱

比起成長的另一個真象，統計造假算是小事，這個真象是：「成長暗藏毀滅因子」。這就是所謂「經濟過熱」，需要降溫的理由。

2003 年中國總理溫家寶宣布「降溫」，理由是經濟過熱。所謂過熱，就是投資過多。投資為什麼會「過多」呢，因為多是重複投資、盲目投資、無效率的投資，導至產能過剩，顯然易見的是將來一定虧本，所以要制止、降低。俗話說：「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虧錢的生意沒人做」，那為什麼會有人做這種投資呢？答案是「政府做的」。那麼，如果「改革開放」廿五年後的 2003 年還有這種投資，那以前沒有嗎？當然有。溫家寶的這次「降溫」，應該算是第四次了。由於中國生產能力過剩（簡稱為產能過剩）並非第一次，至今總共已經發生過三次（1984～1985、1987～1988、1992～1993）。這一次不同的是，有不少民營企業也加入了這波經濟過熱的投資浪潮。朱鎔基當政時，就是用行政手段「降溫」的，結果有些建設硬生生的中斷，導至銀行增加許多壞帳。其實，「降溫」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將來大量的銀行壞帳。

舉一個例子說明「經濟過熱」。全球年產 500 萬噸鋼的企業只有四十個，而僅在中國唐山市周圍的鋼鐵企業就有五十六個，大部分都是近年出現的民營鋼鐵企業，而且目標都是年產 500 萬噸（何清漣 2004b）。類似的例子很多。Studwell 在他的 *The China Dream* (2002) 裡，就談到中國全國平均每個縣有三個水泥廠（頁 232）。現在中國三十一的省市自治區，有二十五個把汽車業指定為支柱產業，

¹ 《瞭望新聞周刊》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三日出版的一期也曾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會同監察部、法制局（現已改為國務院法制辦公室），聯合舉行一次「全國統計執法大檢查」，以求明悉統計數位的可靠性，結果查出統計違法行為 60,000 多起，其中虛報、瞞報、偽造、篡改統計資料占 56.7%；拒報、屢次遲報統計資料的占 18.4%；其他統計違法行為占 24.9%。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政策法規司發言人表示，這 60,000 多起算是比較輕的，另外主案查處了 15,000 多件情節嚴重的「統計違法案件」；當事人要受行政或刑事處分。

僅浙江一個省就有四十多家民營企業在投資汽車行業。目前中國已經有了一百二十多個汽車整裝廠，但產能合計卻比不上一個國際大汽車公司。

為什麼民營企業也來參與這種自殺式的成長呢？江蘇常州籌設中一家民營的鐵本鋼廠，聲稱年產 2,000 萬噸鋼鐵，溫家寶指名停建，江蘇省政府推說並不知此事。這是不可能的。可見民營企業會「投資過多」，也是與政府的土地、貸款等政策與特權密切相關的。

中國大量以出口導向的投資，還有另一個問題，是出口實惠不大。因為中國出口品都是競爭市場，利潤微薄，而進口的原物料則多屬獨占市場，使中國付出較高的進口價格。二〇〇四年出現「進口價格上升、出口價格下降」的現象，貿易條件惡化。若考慮中共在土地、租稅、環保方面的實質補貼，中國可能是「流血輸出」。截至二〇〇三年年底，中共中央政府拖欠的應退未退的「出口退稅」款，超過 3,000 億元人民幣。

根據中共公佈的統計，百分之八十六的工業品供過於求。生產過剩的另一個結果，就是賣不出去，導至存貨累積。在國民所得帳上，1980~93 年間存貨占 GDP 的比率，平均是 7%。台灣正常情況下是存貨占 GDP 的 1%，OECD 國家約在 2%~3% 之間。我們若取中間的 2% 為標準，超過部份（四個百分點）表示賣不出去的無用生產，則中國「七上八下」的成長率，也只剩下「不三不四」而已。

例如，管理學大師 Peter Drucker (2002, 中譯本第 181 頁) 曾生動的描述生產過剩的情況：西安有世界最大的自行車工廠，但西安人都騎上海製的自行車，因為西安製的「這些自行車的品質惡劣之至，只要你看一眼，這些自行車就會垮下來」，「西安現在已經有五百萬輛自行車擱著，賣不出去，但是他們得繼續生產更多的自行車，因為工廠裡雇用了八萬五千人。」根據中國內部資料，國有企業積壓產品年達千億元以上 (岳山 2002)。

3. 銀行濫帳：填不完的漏洞，經濟泡沫化

中國的國營銀行壞帳率奇高，很多信等評鑑公司認為約占貸款的 50%，宣稱應該已經破產好幾次了（規範國際金融業的〈巴塞爾協定〉：銀行自有資產的比率不得低於銀行總資產的 8%，低於此數則應視為銀行破產）。中共也了解其中的金融危機，從一九九八年以來，中國政府曾三次由中國政府向中國、工商、建設、農業四大國有銀行大規模注資。第一次是一九九八年向這四大國有銀行注入了三百三十億美元，以改善銀行資本充足率。第二次是一九九九年又從四大銀行的賬目上剝離了 1,890 億美元的不良貸款，轉給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第三次則是二〇〇三年繼續向四大國有銀行注入資本，規模據稱達 400 億美元左右。

國際債信權威評級機構 Standard & Poor's 於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發表了讓中國政府大為不快的評級報告，該報告全名為「中國金融服務業展望二〇〇四」報告。這個報告對中國政府頒布的利好消息給予了致命打擊，第一，中國主要銀行，包括被中國政府視為王牌的四大國有銀行在內的十二家商業銀行的信

用狀況全為投機級，即 BBB-以下；第二，估計中國銀行業不良資產比例大概在 44%~45%。這與中國官方當時發佈的 22.9%相去甚遠。這不僅與二〇〇〇年世界前二十家大銀行 3.27%的平均不良貸款率相去甚遠，而且也遠遠高於亞洲金融危機前東南亞各銀行的水平（不超過 6%）。

二〇〇四年北京提撥了 450 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另一說是 500 億），等同於新臺幣 1 兆 5,000 億，相當於台灣三十一間銀行股本，補貼兩個國有銀行：中國銀行與中國建設銀行。其目的是要改善銀行帳目，以便推向國際市場募股，但股市專家在經歷中國諸多的銀行醜聞後，已經不再上當。中共對此極為懊惱。

更令人擔心的事，是銀行舊債剛去，新債又生。一九九九年的銀行不良資產為二兆多人民幣，這年由政府注資「剝離」掉一兆四千億不良資產，但至二〇〇二年，四大國有銀行體系內又新增一兆七千億不良資產，意味著每年新增不良貸款為五千到六千億。

4. 失業下崗: 洪水

中國失業率多少，不能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一則因為公布的是「城鎮登記失業率」，但即使限於城鎮失業，這個資料也未可相信。

中國失業真象說不清楚的原因有三，一是失業的定義問題；二是資料的可靠性問題；三是鄉村的失業問題。目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對「待業人員」所下的定義是：「有非農戶口，在一定勞動年齡內（十六歲以上男五十歲以下、女四十五歲以下），有勞動能力，無業而要求就業，並在當地就業服務機構進行待業登記的人員。」在統計局網站裡，發表的城市失業率 1985 年為 1.8%，1990 年 2.5%，2000 至 2003 年分別是 3.1%、3.6%、4%、4.5%。估計 2004 年應該是 5%。

根據中國自訂的失業定義，中國城市失業統計與世界共用標準比較，嚴重低估。一、農民工從農村到城鎮工作，因為依中國的〈戶籍法〉，不能入籍，故不能算入「非農戶口」；二、官方把失業者界定在退休年齡前十歲，意思是男五十歲、女四十五歲起，不能登記為失業，下崗工人也不能登記失業；三、國營事業有大量冗員；四、農村有大量的過剩人口。我們一一調整這些失誤，以 2001 年為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加上下崗職工，失業率為 7.7%；若再加上國企冗員，則提高到 19.3%；再加上農村 1.5 億的剩餘勞動力，²估計全國失業率應為 34.3%。

何清漣 (2002) 說她根據 1997 年至 2001 年的統計年鑒計算，發現即使依據官方資料，真實失業率也高達 21%，這不包括農村失業人口。如果要計算城鄉總合失業率，那就高達 35% 以上。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政協委員王建倫，在二〇〇三年七月的十屆政協第二次常委會分組討論時坦承，目前採用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指標體系，不能

² 根據田君美 (2002) 的估計調整而成。見張清溪 (2002)。

真實反映社會失業狀況，還會掩蓋矛盾並誤導政府決策。中央社於七月十二日的報導中稱，中國全國總工會第五次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大陸「城鎮社會失業率」為 12.3%，大幅高於「城鎮登記失業率」的 4%~4.5%。國家統計局城市調查大隊的社會失業率調查結果，也與總工會的結果相近。

5. 貧富：懸殊

中國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世界最高，吉尼係數（專門用來衡量所得不均程度的指標，介於零與一之間，指標愈低代表越平均）在中國官方統計，2000 年是 0.417，超過九十年代平均數 0.338；民間估計，近年實際上應該已超過 0.5 了，甚至是 0.6 的超高水準。³ 一般的說法是，貧富懸殊到引起社會不安的國際警戒線是 0.4 的吉尼係數。台灣過去的不均度都在 0.28~0.32 之間。

中國的貧富懸殊，實在是太明顯了。城鄉差異、沿海與內陸差異、農與非農的差異似乎已到了難以打破的「兩元」經濟。由於吉尼係數實在太高了，據聞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大教授厲以寧居然建議將城鄉分開計算吉尼係數。這實在是匪夷所思，因為本來「不均度」就是要來衡量這種差異的，把所得高的與所得低的它分開計算，顯示問題已嚴重到難以解決。

2002 年 7 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籌備小組轉發各處一個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完成的《當前社會各階層經濟狀況》調查報告。根據這個調查，大陸私有財富 85 兆人民幣，其中超過 96% 是由占 38% 的城市人口所有；占總人口 62% 的八億農人，僅擁有不到 4%。相對富有的城市人口中，有將近五百萬人是千萬富豪；這些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大城市，以及江蘇、浙江、廣東、山東、遼寧及福建等沿海省份。

調查這些千萬富豪，赫然發現有九成以上是來自有黨、政、軍幹部背景，以及在政壇、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力的高幹子女與親屬。他們的財富怎麼來的呢？該報告披露，主要是從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不斷的官場操控經商、盜買盜賣國家計劃分配的物資、盜買盜賣進出口物資的批文、炒作國土、靠有來頭的人物批條從銀行得到千億元免息免擔保的借貸、炒作上市股票；以及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操控、包攬國家大型基建工程合約，從引進外資中、進口大型設備中收取「回扣」等等。報告中說，國家級、省級工程中，高達 40~60% 的工程費，實際進了私人口袋。

國際上把中國當做世界工廠，更進一步希望中國成為世界的消費市場。但後

³ 近年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所做全國抽樣調查，計算城鄉家庭的吉尼係數，在 0.434~0.445 之間。熊海濱在《經濟潮》總第三期〈全民逐富：中國大洪荒〉中介紹，這些包括各大院校、地方社團、學術機構在內的調查組織，在做了充分的統計之後，認為中國的基尼係數已達可怕的 0.59（中國事務網站，2002 年 6 月，編號 17652 論文）！

者一直無法實現，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的貧富極為懸殊，富者出手闊綽，出國旅遊購買力特強，貧者無立錐之地，根本買不起生活必需以外的消費品。

2004年12月中旬，長期研究中國富豪，並且公佈排行榜的胡潤雜誌估計，中國大約有五萬人財富超過1千萬美元。其中約有兩百人，身家財產已經超過一億美元。這些富豪熱衷購買名車、名錶、名牌服裝，造就了中國奢侈品消費市場的迅速膨脹。此外，研究還發現，這些富豪當中，有不少人喜好一擲千金，向世人炫耀擁有的財富。

中國貧富懸殊危及社會安定的一點，由於中共封鎖消息，中國資訊非常不流通，城市人根本不了解鄉村、農人的貧窮與辛苦。陳桂棣的中國農民調查（2004）出版後，北京引起騷動，因為北京人嚇壞了：原來農人這麼苦！

6. 農業：破產

中國農人受苦，完全不是它〈憲法〉裡講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共建國後，1950年代初，「土改」殺了地主與富農，得到土地的貧下中農高興幾天，1955-56年是農業集體化，造成全面減產，1958-60年「大躍進」造成全國性嚴重飢荒，餓死人口3千萬以上，創世界紀錄。1961-78年推行「人民公社」農奴化”、貧困化農民。1979-84年農村實行承包制，人民公社解體，農民的收入提高，相對社會地位也改善了，可說是過去五十年裏中國農村唯一的好時光。但緊跟著，1985-90年城市物價管制，抑制農產品市場，農用物資價格暴漲，農業經營條件開始惡化，唯尚有「鄉鎮企業」提共農民一定的就業機會。但1992-96年全國性的房地產投機熱和開發區熱，農人大量失去農地、農村金融資源大量轉移城市；1997年迄今，在鄉鎮企業大批破產關閉、鄉鎮政府攤派、大量拆遷賣地的結果，造成「農人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問題」，農業凋零、經營農業收不抵支，農民生活水平在下降，中西部省份的多數農村出現了貧困化趨勢（程曉農 2003b）。

農業部高官承認：當前中國農村就業容量，僅能容納1億3千萬農民、2千萬畜產業者，以及1億6千萬「鄉鎮企業」等非農工作，農村勞動力高達4億8千萬，農村失業人數超過1億5千萬。

中央政府每年以「農業稅」的名義，從農民身上獲取300至400億人民幣，地方政府則以其他名目繁多的「費」，從農民身上獲取1千億元。朱鎔基知道問題的嚴重性，推動「費改稅」，想把「費」取消，但胎死腹中；溫家寶接著推動「五年取消農業稅」，推錯了方向，因為農民的「稅費」負擔，主要是「費」，有道是：「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鄉鎮政府向農人收「費」，名目之多，農人企業家孫大午說「農人賣雞蛋要四十道手續」，也就是要交四十個

「費」。陳桂棣、春桃的《中國農民調查》(2004)對此有詳細記錄。⁴

中國現在有兩套土地制度，都市是國有地，可以變成私有地、私人間可以買賣；在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名義上農民雖然賴以為生；但卻沒有土地所有權；隨時會被收回出售；只給少數補償。在利益的推動下，官員配合房地產商利用欺騙、命令、暴力手段，侵佔了農村的大片土地。專家估計，過去 10 年保守估計，失地農民至少 4,000-7,000 萬（*New York Times* 2004.12.8）。又因農村沒有醫保、住房、退休等任何社會福利，失地農人 60% 陷入極度貧困：務農無地，上班無崗，低收入保險無份。這就是四川漢源十萬農民抗爭的背景。事實上，農民集體暴動，2000 年就有十萬件（白沙洲 2001）。

以農村醫療為例。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在 80 年代初曾將中國的合作醫療制度讚賞地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範」。而到了 2000 年，就是經過了光輝燦爛的世人矚目的二十年，世界衛生組織在 2000 年的 53 屆大會上發表的《2000 年世界衛生系統報告》中對醫療財務負擔的公正性的評估中，將中國列為醫療財務負擔最不公平的國家，排名第 188，全世界倒數第四，列在越南之後。從 1991 至 2000 年間，中國用於農村的合作醫療經費只有一千萬人民幣，其中，中央補助五百萬，地方配合款五百萬，全國農民平均分配不到一分錢人民幣（何清漣 2004e）。

經過鄉鎮政府搜括後的農村，負責累累（李昌平 2002）。據估計，目前全國鄉村負債總債務額已逾 5,000 億人民幣。農村實質上已經破產。

7. 貪污腐敗：制度化

改革開放因為政治體制不改，造成大量國有財產、國營企業被掏空，「權力資本化」、「自發性私有化」等等「原始資本累積」、「國家機會主義」大行其道，這在何清漣的《中國的陷阱》有詳細的記載。

《上海僑報》在推出《誰是大陸最黑的富豪？1990-2004 中國大陸問題富豪榜》之後，再次推出《中國 50 巨貪榜》。該報以媒體、公檢法公開的數據資料，部分逃亡海外的貪官貪污額參考了海外媒體批露的海外資產，以個人及家屬貪污

⁴ 中國有很多很奇怪的規費，孫大午講賣雞蛋要繳四十個費用，包括「計畫生育證明」等。陳桂棣夫婦在書裡提到村幹部有三亂，即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以結婚為例，村民結婚除了要繳結婚證工本費外，還有介紹信費、婚姻公證費、婚前檢查費、婦幼保健費、獨生子女保證金、婚宴消費費、殺豬屠宰費、結婚綠化費、兒童樂園籌建費、計畫生育保證金、晚育保證金、夫妻恩愛保證金、金婚保證金等。其實，中央也沒好到哪裡，書中統計，僅國務院各部委下令向農民徵收的專案，迄 1990 年就有 149 項之多。家庭承包帶給農民的好處，早就一點一滴的蝕光了。

挪用總和做為中國巨貪榜的排名依據，排名時間範圍為 1978 年至今，而部分正在審查中的官員或情況不明仍在「雙規」的官員未納入排名。其中，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原行長餘振東、許超凡、許國俊等人涉嫌貪污、挪用公款 4.83 億美元名列第一名。貪污金額緊追餘振東之後的是陳滿雄及陳秋園夫婦，夫妻兩人在擔任廣東中山市實業發展公司負責人期間，將 4.2 億元轉移海外。

像這類的資料極多。中國的貪污腐敗名聞全球。貪官出逃，造成的資金外流數目龐大。就在鐵面總理朱鎔基當政期間，據何清漣的分析，中共官員的腐敗，已經由「個人腐敗」進化為「組織性的腐敗」，演化為「制度性腐敗」。這時，腐敗已經無法從對腐敗個案的懲處獲得解決，因為，在制度性腐敗之下，揭露腐敗成為打擊對手的手段。

中國幾乎完沒有法治，台商遇到糾紛，多不依循司法途徑，而是以台商協會協商為主。高為邦（2002）遭到司法迫害，其間的經歷，充分顯示法治的破產。

8. 社會道德：殺熟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系教授鄭也夫的評估，中國的誠信已經降到「殺熟」的地步。鄭教授將誠信分為三級，最初級是對「信任熟人」，其次是「信任陌生人」，最高級是「對制度的信任」。中國社會已經連熟人都不能相信，演變到坑殺熟人的「殺熟」境地。

由於貪官污吏橫行。古人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吹草偃」，現在則是君子無德，上行下效，導至社會道德淪喪。在官場上，貪汙納賄、包庇走私、包攬工程、挪用公帑、勾結黑社會；在商場上，假冒偽劣氾濫、不顧損害人命，製造毒米、毒油、毒奶粉等等各種假商、毒商品，誠信全失；在民間，教育界抄襲、剽竊成風，假新聞、假文憑，路見事故集體圍觀、見死不救，鄙視私德、賤視公德。

9. 教育：產業化

改革開放後，中國「教育產業化」，造成學費之高使得窮人家孩子面對學校的大門望而卻步。北京在 2004 年 7 月出版的《中國新聞周刊》報導說，官方統計中國十年「教育亂收費」已達二千億元人民幣。

這篇題為〈學費猛於虎〉的文章指出，中國教育亂收費花樣名目之多，到了令人眼花撩亂的起步。一些城市熱門中小學擇校費或贊助費數額之高，令人瞠目結舌：例如，哈爾濱一所重點小學的擇校費要三萬五千元人民幣、北京一所著名小學漲到七萬元。一些基層政府則通過中小學校，徵收農業稅、敬老院費、集資費、超計劃生育罰款等五花八門的「費」用。還有一些學校強行推銷保險、食品、學具等。

文章中說，中國政府目前對學費的狂漲十分重視，管的力度也可以說非常之大。但學費猛於虎的局面一時難以扭轉。至於亂收費現狀難以改變的原因，有多方面。首先是中國的教育基本被國家壟斷，民間難以進入。所謂民間教育只限於簡單的技藝教育，真正的民間資本在教育中所佔比例極低。

其次，政府對教育的投入嚴重不足。據統計，中國教育投入佔 GDP 比例上世紀八十年代相對較高，後來一直在 2.3% 至 2.7% 之間徘徊，2002 年略增至 3.3%，仍遠低於世界百分之 4.2%。

第三，教育資源分配極不平等。中國的教育資金有限，而鄉村從政府得到的教育經費更加有限，中國農村的教育現狀非常困窘。在城市，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平等表現在學校之間的地位懸殊。望子成龍的家長為了給孩子選擇一個好學校而不惜血本，久而久之，學校與家長之間便在亂收費問題上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第四，「教育產業化」的思路使學校掙錢成為風氣。中國社會本有毀家興學的傳統，但因為長期以來國家壟斷教育，導致這一傳統的中斷。而國家為了轉移自己向教育投資的壓力，在改革開放後提倡「教育產業化」，使教育掙錢成為中國學校的普遍風氣，間接造成了急功近利的社會環境。（見大紀元網，2004.7.23）

最近發生了不少「招生黑幕」，學校利用招生收取黑錢；農民到城市打工的子女無法上學，因為需要大筆的「擇校費」，民工繳不起；農村子女考上大學，父母則因無力負擔學費而自殺，或子女自殺的案件。2003 年 1 月 2 日中國《青年時訊》報導中國的「十大暴利產業」，中小學被列為第二。另外，教育也被列入「五大腐敗產業」之一。《江南時報》在 2004 年 12 月報導，中國經濟評論員魏雅華撰寫的〈2004 年中國十大暴利行業〉一文，學校「亂收費」現象引起家長憤怒，查卷費、考試費、補課費、畢業證書費等，多如牛毛，因此，教育及教材出版業，也列榜上。

中國文盲比例很高。中國教育部宣稱，中國「青壯年文盲率」，從 1990 年的 10.34%，下降到 2002 年的 5% 以下，仍有多達約兩千萬的青壯年文盲。至於「成年文盲」，則更達八千萬人。中新社報導，根據 1990 與 2000 年兩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中國十五歲以上的成人文盲數量，從一億八千兩百萬減少到八千五百萬，成人文盲率從 22.23% 降低到 8.7%。十五到五十歲的青壯年文盲人數，從六千一百七十一萬降到兩千零四十四萬。另外，還有至少五千萬兒童失學。

其實，中國政府公布的數字，大都不可信。以政府教育經費為例，前文報導，已經低於世界平均水準，但《亞洲時報》2003 年 9 月的一篇報導中說，聯合國官員人權委員會代表 Katarina Tomasevski 女士到中國訪問，嚴厲批評中國教育經費偏低，她不但不相信中國官方「教育經費占 GDP 的比例已達到了 3.41%」的資料，而且說「中國每年的義務教育投入只占其 GDP 的 2%，政府只承擔了學校開支的 53%，其餘的費用則轉嫁到了學生頭上」。她還說：「中國在教育上的投入比例，幾乎比任何一個實行義務教育政策的國家都低，即使是非洲的窮國烏干達，在確保人民受教育權利方面都比中國做得好。」

10. 生態與公共衛生：毀滅性

鄭義在他的《中國的毀滅：生態緊急報告》裡，描述森林如何被盜伐、礦產如何被糟蹋、耕地如何流失等等驚人的浪費。舉一礦產耗竭為例：太西煤素有「煤中之王」美譽，是低灰、低硫、底磷、高發熱優質的無煙煤。因為產權不清，自燃加亂採濫掘，煤田大火處處。據估計，從 1966 年起的二十年間，用掉了儲存量 7,000 萬噸，實際開採出來的只有 1,500 萬噸，丟失 5,500 萬噸，利用率僅 21%。

公共衛生方面，2003 年的 SARS（急性嚴重吸呼道症候群）事件，已經說明一切。2004 年 11 月到中國海南博鳌參加「中國科協 2004 年學術年會」、也是發明治療愛滋病「雞尾酒療法」的何大一，對上海媒體表示，中國需預防新一輪疾病流行，下一次全球性的流感，可能對中國威脅最大。

第三部分 / 經濟根基腐蝕的制度因素

什麼因素造成中國經濟的根基腐蝕呢？我們分析其中原因，至少有下列諸端。

1. 改革開放使共黨失去統治基礎

共產黨的理想是社會公平，其極至是實現共產主義。但今天，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而黨國大員在八億貧困人口的基礎上，成為了腰纏萬貫的大亨。中共的思想，從最早的馬列主義，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鄧理論，最後又有三代表。其中，馬列毛的主義和思想，和鄧理論及江代表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馳以至相差萬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擺在同一張神臺上加以膜拜，實在是古今一大奇觀。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一九七九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實質上放棄了「社會主義」，但又保留共產黨專政的統治，因此喪失了統治（專政）中國的合理性。為此，中共只有在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的「貓論」（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耗子的就是好貓）與「摸論」（摸著石子過河）說法下，以「共產黨能領導中國經濟發展」這樣的說法，自圓其說。

為此，中共必須每年都有高度的經濟成長，這也是為何它一定要「七上八下」的經濟成長率，不管是長江大水或 SARS 風暴。

另外，為了減少人民的批評，政府率先「一切向錢看」，從過去的政治掛帥，物極必反的變成現在的「經濟掛帥」。什麼道德、正義、謊言、暴力等等都不顧，只為求得政權的維持。

改革開放後，在先天缺乏宗教信仰，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破壞傳統文化，使文化失根，現在又失去共產理想，領導人也像毛澤東那麼鬥爭力量，於是造成官員腐敗、企業呆帳、社會殺熟的道德淪喪。

其實，共產黨「一切為專政」，任何政策都是為了維持政黨專政，根據程曉農（2003）的說法，自始如此，並非從改革開放才有的。程曉農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毛澤東的集體農場政策，一個是朱鎔基的「費改稅」政策。

朱鎔基因為李昌平（2002）上書而了解了「三農問題」，⁵一心想要解開農人身上的枷鎖，實行「費改稅」（意思是取消壓得農人喘不過氣的各種亂攤派的苛捐雜「費」，將農業「稅」稍提高，以減輕農人負擔）。這個辦法在安徽試辦了一年，說是很好，要全國通行。地方幹部反應是：一旦實行「費改稅」，幹部工資、福利不會少，但農村教育（在中國基層教育也是地方負擔）就不辦了，你

⁵ 就是李昌平講的「農人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中央自己負責。程曉農說，當時北京一個著名經濟學家向朱鎔基的智囊、當時的國務院體改辦主任王岐山（現任北京市長）講：「你告訴老闆，說共產黨要想活下去，就別再搞什麼費改稅，他想明白就行了，你到底靠誰？」王岐山把話轉給朱鎔基以後，朱鎔基突然明白了。（明白什麼呢？明白他靠的是各級幹部，不是靠農人。）於是，「費改稅」在一段小小短暫熱潮後就悄然止息了。

毛澤東的政策發生在 1955-56 年間。在那之前農村已經開始休養生息了，但那年間忽然大規模快速推行農業集體化。這個政策受到農民的抵制、也違反中共對農人的承諾，還造成農業減產。那為什麼一意孤行呢？中國的農業經濟界一般把它解釋成中共要實現烏托邦理想，是「認識上」的失誤。但近年學者通過採訪與查閱資料，發現其實強行農業集體化還有一個來自農村基層幹部的壓力。因為「土改」後大多數農民安心務農，家庭經濟情況迅速好轉，但那些「積極分子」（地方幹部）的政治經濟地位開始下降。這些人於是向上傳遞著一種資訊，當時有句很典型的話，一直送到毛澤東那裏，叫作「還走不走社會了？」什麼意思呢？基層幹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全然不懂，他們把社會主義濃縮成「社會」這兩個字。他們問這句話的意思是：你上面還讓不讓我們這些基層幹部出人頭地？為了維持黨員、農村基層幹部的威信，方便共產黨專政，毛澤東於是通過強行推行快速農業集體化，建立起了職業的農村幹部隊伍，鞏固了黨對農村社會的全面滲透和控制。

2. 共黨的本質

現在中國的亂象，更多是來源於中國共產黨的本質。什麼是共產黨本質呢？我們可以把它歸納為：欺騙、暴力與專政。

- (1) **欺騙**：美國國際商業理事會副主席 Adam B. Greene 表示，很多國家與外商希望將人權帶到投資國，但問題還在當地法律是否能保障人權。他說：「例如，中國的憲法允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是具體操作起來，顯然是跟憲法上寫的非常不同。」其他國家可能政府有意願要做，但做不到；而「中國的情況是政策性問題」。也就是說，中國是政府根本不想實施的問題。中國的這種講假話、講大話、講空話的「假大空」問題，並不是從改革開放以後才有的，而是共產黨還沒有得到政權之前就這樣了；在一九四五年建政以來，也絲毫沒有改變（參見大紀元 2004）。

為了鎮壓法輪功，中共可以在 2001 年 1 月 23 日於天安門，公然製造一個自焚案，當場把一個女子打死，然後誣衊說「法輪功鼓勵自殺，是邪教」來迫害法輪功學員。這種事都可以做了，區區在 GDP 上做個手腳，又不死人，有何不可！

- (2) **暴力**：「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共產黨宣

言在最後是這樣結尾的。暴力，是共產黨取得政權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這是這個黨產生之日起便被決定的第一個遺傳基因。毛澤東的名言「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正是這種生存邏輯的表白。和這個表白同樣聞名的，是毛澤東的另一句話：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來一次」。重複使用暴力，是共產黨政權維持統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製造恐懼。每一次鬥爭運動，都是共產黨的一次恐懼訓練，讓人民內心顫抖著屈服，以至成為恐懼的奴隸。

中共的暴力殺人，從它還沒有當政之前就開始了。1949年建政之後，利用「鎮反」「土改」「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一直到「法輪功」事件，殺人如麻，手段殘忍，所造成的人民「非正常死亡」有數千萬，超過過去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現在對台商的司法迫害（如見高為邦 2002），只是表現它的一貫如此。

- (3) **專政**：中國憲法第一條的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其中「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人民」、「民主」及「社會主義」都不存在，只剩下「專政」，因為該條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專政國家」。這個專政國家，一切為共黨持續執政為最高指導原則，沒有監督，沒有制衡（司法置於行政的「政法委」之下），行政權獨大。根本沒有想要解決農人問題，也沒有能力解決。

從毛澤東以來就是如此（參見前一段）。共產黨從沒有祖國，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極端民族主義；從剝奪所有私有財產，打倒一切剝削階級，到今天的吸引資本家入黨，其基本原則南轅北轍自不必說。在其發跡和維持政權歷史上，昨天堅持的原則今天放棄，而明天又再改變的事情比比皆是。但無論如何改變，如何沒有原則，共產黨的目標明確，那就是奪取和維持政權，以及享受社會權力的絕對壟斷。

3. 吃大鍋飯心理

共產黨的經濟制度，就是吃大鍋飯，工資每人一份，權責不清，獎懲不明。改革開放之後，國營銀行呆帳、國營企業虧空，因為仍然是公營。更嚴重的事，雖然中共已經實行「撥改貸」，由以前財政撥款給國營企業，改為向銀行貸款，但吃大鍋飯的心理依然存在。影響所及，目前很多國企主管向銀行借錢，並沒有還錢的觀念。上海一個國營銀行主管這樣說，國企官員告訴他：「你何必催錢這麼急呢，我們都是一家人（都是公營事業），你的錢不就是我的錢嗎，幹嘛從這個口袋換到另一個口袋呢？」

4. 產權不清

「共產」就是財產國有，但名義上雖然國有，實質上仍然有人管理、經營、處分。因為產權不清，在改革開放前雖然無效率，但財產還可以由政府控制。改革開放後，產權不清的缺點暴露無遺。鄭義在他的《中國之毀滅》裡寫生態的破壞，無論是森林的毀絕、水土流失、勢不可當的荒漠化、地質災變、耕地超載、水資源枯竭、江河湖乾涸、物種滅絕、礦產耗盡，以及各種各樣的污染，他在每一章後面檢討時，都歸因於「產權不清」。舉例而言，由於產權不清，在開採礦產時，根本不知愛惜，像強盜一樣，只採容易採的，其餘隨便丟棄，造成極大的浪費，如前所述。

5. 財政聯邦主義

中國的中央與地方財政分權，超過一般人想像的「地方分權」。所謂地方分權，有人稱為「財政聯邦主義」，是給地方相當的財政自主權，包括收支兩面，最極端時相當於地方包稅（稱為「包乾」），即地方上繳給中央一筆固定稅款，其餘歸地方支用，目前的作法是分帳，但仍相當程度保留地方分權。這有它的歷史因素，但地方分權對經濟發展產生正反兩面的影響。

在好的方面，是地方政府對「招商引資」非常熱心，因為自己負有籌措財源的壓力與自主運用的方便。台商剛到大陸時，很多體會到縣長、市長甚至省長隨時應召，親切熱心，即肇因於此。壞的方面，就是有加稅的權力，甚至連鄉鎮或村政府都有這樣的權力，因此不免任意加稅，特別是在農村地區以各種規費名義，增加農民負擔。三農問題，泰半由此而來。

地方財政分權，也是「經濟過熱」的來源，它還有個副作用，就是造成「地方主義」，各地方政府各自保護自己的產業，打擊外省企業。又因缺乏監督，官員貪污腐敗也應運而生。

有人可能以為（我以前就是這樣想的），讓各地方政府有自由權限，可以產生相互競爭，發揮政府之間的「市場機能」。那為什麼不行呢？因為政府有公權力，讓政府介入營利行為就是不對。二百多年前，亞當·斯密就說過：「政府是最壞的商人，商人是最壞的政府」「沒有比政府與商人之間更矛盾的性格了」。此言果真不虛。

6. 改革路線

1978年鄧小平感到中共已走到危急存亡的關頭，再不變動就要亡黨亡國了，於是推行「改革開放」。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一心追求發展，怎麼做呢？他有兩個理論：「摸石頭過河」，被稱為「摸論」，以及「不管黑貓白貓，

只要能抓耗子的就是好貓」，稱為「貓論」。在這兩論之下，追求經濟發展卻沒有最終目標（因為是摸論：走一步算一步），但又不擇手段（貓論：不管黑貓白貓），但使得中國的「制度轉軌」走上一條「漸進療法」：只有經濟政策，沒有政治改革（連經濟制度都沒有）。在這條路上，表面上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政府權力依舊，大小事情都要「審批」，實際上還是共產主義。其結果是「國家機會主義」橫行，就是說大小官員、國企與國營銀行主管，都以權謀私。

除了造就貪污腐敗的官僚外，這還產生了兩個嚴重後果。一是為防止獨占於政治的私營部門崛起，中共極力扶持國有企業，並在開放政策下推行有利外資的政策。因為國營企業是扶不起的阿斗，這導致外資企業在製造業出口部門的領先地位，在中國國內市場也取得了重要的位置，真正的民營企業難有競爭能力。

第二種後果是，缺乏政治改革的經濟改革，使管理人員滋生出追求短利、地方主義和一個企業內過度多樣化的「企業文化」，但各省又有過度同質化的國企。絕大多數的中國企業把精力都放在培養與上級官員的「關係」上，不去思考如何建立橫向聯繫、以及為長遠利益進行的技術發展和投資。

最嚴重的問題，是這個「漸進療法」是一條「後發劣勢」的死胡同；見下節說明。

第四部分 / 解決無望

中國經濟根基腐蝕的問題，在現制中共政權下沒有解決的希望。原因是因為沒有一個可以依靠的東西，來糾正中共的腐化，包括中共黨政內部（沒有制衡的機制）、外部（輿論是黨的喉舌）、外資與外國政府或機構（同流合污）、中產階級（沒有獨立於政府的力量）、知識份子（已納入共犯結構），以及轉軌的制度（後發劣勢）。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起動中共的「政治改革」，因為任何變動都可能導至中共下台，而中共是不能下台的；這是中共為什麼「要把任何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之前」的道理。

1. 內部不行：沒有制衡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裡，稱孫中山為「先生」、毛澤東為「主席」，顯然這部憲法是置於共產黨框架之下。又因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中國共產黨」之下。

如此，一個高高在上的共產黨，就不會有任何制衡的機制了。那麼誰在運作這個共產黨呢？是黨「總書記」；總書記兼任國家主席。中央是黨政合一，中央以下，中國有兩套機制：政府與黨。而且，黨高於政府；如：省委書記高於省長，縣委書記高於縣長。

黨最大，沒有制衡，連「黨內監督條例」都通不過，其實通過也是具文而已。而政府這個系統，也沒有制衡，在中國沒有「三權分立」，行政權獨大，司法受置於「政法委」，沒有制衡行政的獨立能力。

在沒有制衡的中共官僚系統裡，國務院的審計機關去各部會審計，發現很多問題，產生了很大的「審計風暴」。但是雷聲大雨點小，甚至有些單位還反彈，最後不了了之。如前文談到查到幾萬個「會計作假」，但依然年年如此。

有人說，中共官員腐敗，就像「藍子裡的螃蟹，你夾著我，我夾著你，強要把他分開，就會斷手斷腳」。這是「制度性腐敗」的結果。這個黨內是不會產生「政治革新」的機制的。或許有一天領導發現不做政治改革不行了，但他一做，只會加速中共的滅亡。

2. 外面不行：媒體是黨的喉舌

政府之外，最大的制衡有兩種：選舉與媒體。人民透過選票，把不好的人依法讓他下台，這是民主國家的機制。中國實行專政，口中說得好聽，（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人民完全沒有權力，

只能任政府擺佈。

至於媒體，更不能監督中共。一向的說法是：「媒體是黨的喉舌」。媒體人自嘲：「我是黨的一條狗，天天守在長門口，長叫咬誰就咬誰，叫咬幾口咬幾口」。

中共控制媒體，無所不在。所有的報紙、雜誌、電台、電視都是國家經營。境外媒體一般不准入境，少數允許入境者，受到嚴格監視。例如，2004年7月1日香港發生五十萬人上街遊行，要求民主、普選，但在廣東可以直接看到香港的電視，在報導遊行時，中共用廣告蓋掉了畫面。生活在中國的人，根本不知道香港發生了這麼大的事。

網路是另一個消息來源。這是中共的最愛，也是最痛。中共一心想要稱霸國際網路等電子產品，包括要自設「標準」。⁶這個新興行業有無限商機，又涉及訊息的傳播，中共想控制又遇到很多困難。為了網路突破中共的資訊封鎖，中共花了八億美元的前期工程款，雇用外國公司發展了一套可以監視人民的全新高科技監控系統，叫做「金盾工程」。

3. 外資不行：同流合污

很多外商遊說他們的政府支持其在中國的投資，其中一個理由，說是可以透過商業的交往，促進中國的民主、法治。但最大多數的結果是同流合污，包括政府與商人。

德國總理施羅德與法國總統席哈克是政府與中共同流合污的代表。為了得到與中國的貿易，不顧中國對外的武力威脅，兩人都無恥的競相呼籲歐盟「取消對華武器禁運」，以獲得中國在貿易上的回報。2004年12月，施羅德就因此在他訪華期間拿到了兩筆大型合同。一筆是中國與歐洲空中客車公司簽署的認購23架空中客車飛機，總金額為10億歐元，約13億4千萬美元。此外，中國還和德國西門子公司簽署價值4.8億美元的火車購買合同和另外2.8億美元的動力設備購買合同。法國總統希拉克10月訪華期間，就促成雙邊達成了50億美元的合同。中國一向把貿易拿來當做政治手段，利用一些國家對「輸出中國」的貪婪，一方面減少先進國家對它惡劣人權紀錄的軟化，同時離間歐美的關係。

在企業方面，有些人發「獨裁的國家更好賺錢」，只是沒有保障。為了賺錢，部份外商甚至屈膝於中共違反人權的要求。如 *Washington Times* (2003.12.3) 報導說，總部位於德州達拉斯的美國化妝品公司 Mary Kay 在2003年8月，要求每一個中國的銷售員工簽署一份「保證書」，表示不煉和不支持法輪功，淪為中國政府迫害人權的幫兇。《人民報》(網站，2004.6.18) 曾報導義大利名牌娃娃 mydoll 卻是中國勞教所的奴工產品。

⁶ 2003年開始，中國一直想要自設無線局域網國家標準 WAPI。這項努力到2004年10月才在美國壓力下打消。

Gutmann (2004) 根據他在中國工作三年的親身經歷，著書反思外資在中國的投資。他在書中披露一些鮮為人知的官商內幕，如 Motorola 公司代表以向中國官員行賄打開市場而引以為榮；Asia Global Crossing 的經理揮金如土造成公司財務虧損，利用色情公關拉攏公司代表。除外，為了商業利益，思科(Cisco)、西門子(Seaman)、美國在線-時代華納(AOL-TIME WARNER)、摩托羅拉(Motorola)、北方電訊(Nortel)、諾基亞(Nokia) 以及像 McAfee、Norton、Trend Micro 等等這些叫得出名的以及其他許多小的科技公司，爭相出賣攔截技術、病毒、監視系統、間諜裝置給中共政府，來幫中共封鎖網路、迫害異議份子與法輪功學員。⁷

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先進國家只有美國，願意積極主張人權，提案譴責中共迫害人權，但都因其他國家消極抵制而未能成功。

外資不僅不能影響中國走向民主，外商甚至還加深加重中國的行賄、貪污、與腐敗。根據何清漣(2004c)的觀察，外商開始因不會行賄遭遇到挫敗後，很快學習到中國的腐敗，而且還「青出於藍」，造成對中國更不好的影響：第一，為了經濟利益，回頭去遊說其母國政府，要求他們不要批評中國的人權惡狀，減輕中國與國際人權接軌的壓力，更可以為所欲為。

第二，外資幫助中國腐敗官員建立了一種另類「政治退出機制」，以提供國外賬戶、協辦外國護照與錄卡、為貪官的家屬子女辦理海外留學或移民等方式，方便自己行賄並建立讓受賄者洗錢機制，最後好貪官捲款出逃。貪官既無後顧之憂，貪污腐敗就更順暢。

4. 中產階級不行：紅帽子當頭

經濟政治學上有一個「中產階級效應」，意思是說，中產階級形成後，會因為在經濟上的獨立自主，進而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近代民主國家也是因為國王要向商人課稅，因此與商人妥協的結果。在中國，「改革開放」前，所有生產工具全部被共黨沒收，人們沒有自立的經濟能力，沒有尊嚴，喪失自由的精神與意志，沒有自信。改革開放後，私有財產權慢慢恢復，這些失去的東西會不會也慢慢恢復，進而獨立自主，從經濟獨立進而要求參與社會事務，再進行要求政治民主？

但是，這個中產階級效應，在中國很難成立，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富豪，大都是依賴政府特權而致富，是既得利益者。在形式上，很多私人企業為了獲得官員的照顧，實質或表面上與國營事業合作，俗稱「戴紅帽」。這種依靠政府特權的中產階級，怎麼可能回頭來毀了他們安身立命的政府特權呢？

當然，中國也有少數不依賴政府而致富的企業家，但下場通常不好。孫大午

⁷ 這些舉措，直接受害者是中國人，但病毒被中共軍事專家推銷「超限戰」的戰術中，被用來攻擊台灣、日本與美國。Gutmann (2004) 形容說，美國商人賣了繩索給中共，最後卻用來套在美國的脖子上。

應是典型的例子。孫大午在河北白手起家，1995年大午集團被國家工商局評為全國最大500家私營企業之一，出事時擁有五個分公司十六個分廠，1,500名職工，大午學校2,500名師生員工。由於孫大午不但不依靠政府特權，不向官員行賄，且還批評政府對企業的干涉，批評政府金融業的腐敗。2003年被拘留，大午集團一夜之間潰不成軍。

產生「中產階級效應」的中產階級，必須是自立更生的企業家。這點在香港表現無遺。1997年以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港人有自由、法治但無政治權力。一般人都認為香港商人只會賺錢，有政治冷漠症。但是六四事件發生時，百萬港人走出來支持學運與民運。回歸後，港府要為〈基本法〉二十三條訂定言論叛國罪的法律，有七、八十萬港人再次走向街頭。2004年七一時，再有五十萬港人遊行要求民主與普選。這些跌破眼鏡的行為，正是因為港英政府採取自由政策，香港企業家都在競爭環境下，靠自己的力量成為中產階級的。

5. 知識份子不行：共犯結構

知識份子被稱為是「社會的良心」，經常會為社會公益批評當局，形成社會改革的助力。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就是這種行為的表現。

但是，六四後，中共改變策略，把原來被鬥成「臭老九」的知識份子，重新捧上天。在中共籠絡的結果，政治精英、商業精英與知識精英三者結成利益共同體，知識份子一下子變成利益集團的一分子了，當然不會再去批評政府、要求政治革新了。

不但如此，知識份子還會去美化政府。例如，當中國腐敗氾濫成災時，居然有經濟學家為文支持腐敗，稱這是「改革的代價」，甚至有說過去共產主義為了「公平」，犧牲了「效率」；現在追求「效率」，所以要以「公平」為代價。云云。

我們不能期望共犯結構的知識份子，去推動政治革新，因為這些人正是要被革新的對象。

6. 制度不行：後發劣勢

中國採行的「漸進療法」，短多長空，稱為「後發劣勢」。

與「後發劣勢」對立的是「後發優勢」。所謂後發優勢，是說走在後面的人，既然看到前人的成功與失敗，因此可以擷長補短，不必重蹈覆轍，發展起來更迅速，甚至可以超越前人。例如，先進國家二十年才完成的成就，後進國家五年就完成了。

所謂「後發劣勢」，英文原稱“curse to the late comer”，本意是說「對後來者的詛咒」。為什麼後發者不但屈居劣勢，還要對它詛咒呢？原來，落後國家不

論在制度上或技術上，都落後於先進國家。但在技術上，往往有更多模仿發達國家的空間。因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術更痛苦，更觸痛既得利益。因此，落後國家通常用「技術模仿」來代替「制度模仿」。其結果雖然可以使落後國家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緩，以致留下許多長期發展留的隱患，甚至導致長期發展可能失敗。這種現象，就是所謂的「對後來者的詛咒」。蘇聯時代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典型的「後發劣勢」例子。它學習先進國的成果，甚至有一段時間還迷惑了不少經濟學大師呢！但它最終崩潰，就是對它的詛咒！中國呢？一個永遠不能下台的共產黨，阻礙了它所有可能的憲政、政治革新，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永遠只能是技術性的、表面上的、局部的、失衡的成長。它的「改革」開放，改變的只有「經濟政策」，連「經濟制度」都不是，更不用說「政治制度」的革新了。因此，它的「成長」本身，可能就隱藏著來日崩潰的因素，如前文所述。這就是後發劣勢，也是它的宿命吧。

7. 沒有信仰：不行

共產黨自稱是個無神論者，因此宗教被中共無情的迫害。民間的信仰，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毀滅性的破壞。1992年以來在中國盛行的法輪功，則被江澤民自1999年後全面鎮壓。這種對宗教信仰的破壞，將不可避免的對中國經濟產生長期極大的傷害。

一般人可能認為這是迷信。但也有許多學者認為，文化會透過影響人的誠實、節儉、勤奮工作、以及對陌生人的開放等，來影響經濟發展。Barro and McCleary (2003) 最近的研究發現，作為文化的一個重要層面的「宗教信仰」，是影響經濟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Barro and McCleary 分析不同國家的「宗教參與」和「信仰」對於其經濟繁榮的影響。他們利用在1981-1999年間進行的六種國際調查資料，以衡量59個國家的宗教虔誠度。作者首先考量經濟發展、政府對宗教的影響以及對宗教的信守程度，對宗教虔誠有何影響。接著他們評估宗教虔誠如何影響經濟成長。結果發現，高度的宗教虔誠，會促進成長；因為宗教信仰會維持那些提高生產力的個人行為。他們進一步認為，是因為「宗教信仰」的本身，例如相信天堂、地獄、來生等，而不是「進教堂的頻率」，會提高經濟成長。換言之，經濟成長主要是取決於信仰的程度，勝於宗教的歸屬。根據統計分析，他們認為「信仰會影響經濟成長」，而非相反的方向。

Barro and McCleary 的發現似乎很驚人，然而這卻不是學者第一次發現信仰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大約一世紀以前，社會學的創立者韋伯 (Max Weber)，就已經發現基督新教徒的工作倫理，就是促成北歐和美國富有的因素。

更早以前，二百多年前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就在他的《道德情操論裡》，

說一個由私心之個人組成的社會，能夠順利運轉，是建立在三個因素上：良心、法律、死後下地獄。這三個因素，「死後下地獄」（也就是宗教信仰）是最穩定可靠的因素。

沒有宗教信仰的社會，是一個可怕的社會。

第五部分 / 中國經濟奇蹟：為什麼還沒崩潰

北京的「中國社會學會」會長陸學藝接待過很多外國社會學家，他們對中國現象大惑不解的問：城鄉實際收入差距已達 6: 1，居世界前列，如果在其他國家，早就會發生動亂，為什麼中國還能保持基本的社會穩定？⁸

是的，很多人因為中國現象與他長期觀察的推測不符，甚至對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是否真有問題，都產生了懷疑。中共官員口中常講一句話：「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而且已經講了十幾年了。這就是中國真正的經濟奇蹟：漏洞百出，卻仍安然運作，而且還表面亮麗！

以下我們提出這個「奇蹟」的觀察。有幾個理由，可以解釋這個奇蹟。

1. 超高儲蓄率

中國人民有全世界最高的儲蓄率。超過一半的所得被儲蓄起來。又因中共一直還限制外國銀行在中國境內吸收存款，因此人民只能把錢存入國營銀行。這是銀行雖然呆帳率超高，仍然順利運作的理由之一。

2. 外資

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截止到 2004 年 4 月底，全國累計批准設立外商投資企業 47 萬 9,605 個，合同外資金額 9,901 億美元，際使用外資金額 5,211 億美元。2003 年，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外人直接投資之接收國。

對實質已經破產的中國國營銀行，這些外資是很珍貴的。

3. 欺騙

銀行是信用業，雖然虧空了，但只要人民相信政府，銀行還可以運作。在危

⁸ 2001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以陸學藝為首的課題組推出《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http://biz.163.com/special/p/pl812111.html>)，鮮明提出中國社會已經由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分化成十大社會階層，引起了海內外的極大關注。而作為續篇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則重點研究了這十大社會階層是如何分化演變而成的，到底是什麼因素在影響一個人從社會低層向上流動。

急時，人民甚至會配合政府來維護銀行。

中共嚴密控制所有媒體，包括網路。當然它有漏網之魚，但絕大多數人是被中共矇騙了。嚴格控制消息，一方面對政府不滿的人民，無法做橫向連繫。一方面也讓不滿的民眾孤立。中國的《瞭望》雜誌估計，在 2003 年，中國發生了將近 6 萬起地方騷亂事件，捲入 3 百多萬人。換言之，每天有 150 次騷亂事件發生，假如人們知道有這麼多同病相憐者，對抗爭的士氣相信有鼓舞作用。

Studwell (2002) 就說，在中國是完全是靠信心而存活著。

許多中國人認為，共產黨不好，但沒有共產黨，中國會亂，更不好。這都是受到中共的謊言與消息的封鎖所毒害了。

4. 屠殺

中共建政五十五年是用鮮血與謊言構成的。估計中共歷次鬥爭，「非自然死亡」的人數，在六千萬到八千萬之間。約有一半的中國人，受到中共的迫害。中共殺人不是因為那人犯了什麼罪，而是看有沒有需要。當人們怕中共時，殺的可以少一點；當人們不怕中共時，就是殺更多人來立威。在這種情境下成長的中國人，天生就怕共產黨。

這是可以理解的。台灣只不夠經歷了一個「二二八事件」與其後的白色恐怖，很多為人父母者在子女長大要進入社會時，會交待說：「出社會後，當流氓都可以，就是不要去採政治。」

5. 天意

除了以上理由外，也許天意還認為中國尚不該絕。2002 年冬天到 2003 年春天發生在中國的 SARS，已經導至到中國投資的外商，對中國裹足不前了。當時，中共怕外資不再進去，人民為了屯積物質到銀行領出儲蓄，導至銀行破產，有消息說，上海解放軍已準備妥當，隨時可以接管銀行了。

若 SARS 忽然消失了，就像它靜悄悄的來。若 SARS 再停留幾個月，中國可能早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了。

結論: 奇蹟不可能持久

《遠東經濟評論》在 2004 年 12 月刊出美國 Indiana 大學歷史教授 Jeffrey N. Wasserstrom 的一篇長文，檢討中共統治危機的問題。文章裡說，中共目前面臨的統治危機，不是來自六四事件時的那種城市、高階層的學生與企業家，而是來自全國各地、偏遠地區的民眾，那些以前比較平靜的地區，現在因為拆遷、受到政府不公對待的百姓。四川漢源事件以及各地層出不窮、遍地開花似的抗爭，也標誌著不同於六四時代可以全國連線的抗議。

1. 面對抗爭招架乏力

這種抗爭，以漢源為例，⁹已經敢正面對抗警方，一掃過去逆來順受的，就在最近，這類事件頻頻發生，包括四川萬州事件、¹⁰廣東揭陽事件、¹¹福建永定事件¹²等等。

社會大規模騷動事件，據 Washington Post 在 2004 年 11 月初援引中共刊物《瞭望》的官方統計數位說，中國在 2003 年發生了大約五萬八千起重大社會動蕩事件，平均每天為一百六十九百起，比 2002 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¹³2004 年大規模騷動更多；在年底相繼發生了河南中牟農村民族械鬥、廣東東莞千名工人罷工、陝西咸陽數千工人七個星期的罷工、以及南京科技器材二十六廠工人的十天靜坐，就是近期發生的典型社會騷亂事件。

面對無日無之的社會事件，中共自有其自處之道。它的辦法就是全力粉飾太平，「穩定壓倒一切」。但是，裡面腐爛了，外著華麗，這是不能永遠撐下去的。當黨發生危機時，為了照顧黨，什麼都可以做：它可能暴力，可能開革開放，可

⁹ 中共在四川瀑布溝建壩蓋電廠引發漢源十萬農民抗爭事件，因中共嚴密封鎖消息，真相一直不為外界所知。但經大紀元記者電話採訪，得知中共軍隊開槍打死至少十七名農民。之後美國之音記者深入漢源縣，發回驚人的報導：目擊者稱「有上萬人被打死」。這是繼「六四」後，中共再次以軍隊血腥鎮壓人民的驚人流血事件。

¹⁰ 2004 年 10 月 18 日在四川萬州有一對自稱當官的棒打一名民工，結果引發數萬人圍攻官府、毆打警察、燒毀警車等等暴力事件。

¹¹ 廣東省揭陽市因榕華大橋收費不給收據糾紛，收費員毆打一名婦女，引發收費站在 2004 年 11 月 10 日晚被一千多村民燒燬後，有兩三萬人圍觀並參與了燒燬收費站建築、警車和兩輛救火車。

¹² 有「土樓之鄉」美譽的福建省永定縣，2004 年 10-11 月間當局準備清拆縣城舊區時，受影響住戶因不滿賠償額過低，拒絕遷出，多次與警方發生大規模衝突。

¹³ 這已經讓人發毛的數據，顯然是嚴重低估的數字。據白沙洲 (2001) 引自多維新聞社來自中國官方的統計，2000 年全國共發生十萬件民眾抗議事件，「但一般相信實際發生的案件遠高於統計數字」（頁 10）。而騷動事件是年年增加的。

能平反，或其他的如文化大革命等等，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維護黨的生存。

過去，中共迫害人民後，給人民平反，人民要感謝它的恩德。但今天，在人們走頭無路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人民已經敢燒警車、翻警車了。

2. 我們的應對之道

中共像是坐在火山口上。現在的問題不是中共會不會崩潰，而是何時崩潰。這個集古今中外邪惡於一身的中國共產黨，就像馬克思在他的〈共產黨宣言〉裡講的：一八四八年，「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這個遊蕩的幽靈在傳染病一樣氾濫世界，經過俄羅斯傳到中國，透過欺騙、謊言、暴力等流氓手段，剷除了中國優良傳統文化，將共產黨那套思維方式強加於人民身上，就如同「邪靈附體」一般，以無神論從事造神運動，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教。

共產黨的專政與歷史上所有的專政不同。中國古代社會，實際上是一個二元的結構，農村以宗族為中心自發組織，城鎮以行會為中心自發組織；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機構，只管理縣級以上的政府事務。但在中共統治下，所有基層組織全部消滅。古代帝制下，人們仍然保有私有財產，即使最專制獨裁的德國納粹，人們還是有私有財產權；但共產國家，所有生產工具全部被統治者沒收，所有人都為統治集團工作，實際上是它的奴隸。

在中國，黨組織無所不在，無所不管，但人們從來看不到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財政預算，只有國家的預算，地方政府的預算，企業的預算。無論是中央政府一直到農村的村委會，行政官員永遠低於黨的官員，政府聽命於同級黨組織。黨的開銷支出，均由行政部門開銷中付出，並不單列開支。

人民在它統治之下，被灌輸了共黨毒素，用封鎖一切消息，成功對全中國洗腦，說人民用它的思維方式思考，達到完全被控制而不自知；人們甚至會擔憂：「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如果人們能夠把這個思想毒素清除，不再被它控制，共黨幽靈就沒有賴以生存的基礎，它就垮了。別看它平時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樣子，一旦它不再能一呼百應，它就傻了。想當年，貴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平日不是威風凜凜、前呼後擁嗎；他被毛澤東鬥死時，是活活餓死。那時，他的兵、他的將，到哪去了？

台灣的政治、經濟乃至社會問題，包括台海危機、統獨問題、政黨惡鬥、媒體歪曲等等，都是附著在中共這個惡靈之上。解決了中共，就會讓台灣問題解套。而解決中共，並不需要武力，需要的是人心，需要的是中共的透視，需要的是認清中共的真面目，需要的是掙脫共產黨對思維的控制，從生命中清際中共灌輸的一切邪說，恢復良知。

台商到中國投資的危機，最有效、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公布中國經濟根基腐蝕的真相，公布中國共產黨的流氓真面目。

中共每次立場和原則發生改變，都是因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無法回避的危機而引起。從國共合作到內戰，從反美到親美外交，從封閉到改革開放，

從「共產黨無祖國」到推動民族主義，無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協都是為了對權力的奪取或者穩固。每一次的鎮壓--平反的週期迴圈，也莫不由此而發生。六四屠殺之後維持的「穩定」到現在已到極限，中共又要耍什麼「改變」了。我們不能讓它又再欺騙一次，再不能讓它的謊言得逞。

我們怎麼辦呢？無需武力、無需手段、無需責罵、不必組織，也不需要多少經費，我們只要認清中共的真面目，唾棄它，不再受它欺騙，讓它沒有市場了，那它還不垮嗎？不垮也不遠了。

把共黨邪靈從每個人的思想中剷除，從台灣推向全世界，最後到中國大陸。當共產邪靈沒有地方附身了，它離灰飛煙滅的日子還遠嗎？

參考文獻

- 大紀元 (2004) 《九評共產黨》，台北：博大。
- 大前研一 (2002) 《中國，出租中》，許曉平譯，臺北：天下，2002。
- 于祖堯 (2002) 〈中國經濟的內憂〉，《戰略與管理》雙月刊，第 2002.4 期。
- 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 (2002) 〈最嚴重的警告：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不穩定〉，《戰略與管理》雙月刊，第 2002.3 期。
- 白沙洲 (2001) 《中國二等公民：當代農民考察報告》。香港：明鏡。
- 田君美 (2002) 〈中國嚴重的失業問題〉，《大紀元周報》，67 期，7 月 11 日。
- 田君美 (2003) 〈中國的『三農』問題〉，《經濟前瞻》，87 期，五月，38-43。
- 司馬泰 (2004) 〈從「利益取向癌變」看中共的現狀和出路〉，9 月 13-28 日，大紀元網。
- 何清漣 (2001) 《中國的陷阱》，二版。台北：Taiwan News。
- 何清漣 (2002) 〈中國的統計不可靠〉，《大紀元周報》，87 期，11 月 28 日。
- 何清漣 (2004a) 〈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當代中國研究》，第 2 期（總第 85 期）。
- 何清漣 (2004b) 〈是生產能力過剩還是經濟過熱〉，《Taiwan News 財經文化周刊》，134 期（5 月 19 日），74-77。
- 何清漣 (2004c) 〈一個虛假命題的破產 — 談外資大量進入中國將會促進中國政治民主化〉，大紀元新聞 <http://www.epochtimes.com/b5/4/8/6/n618915.htm>。
- 何清漣 (2004d) 〈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 — 中國人權研究報告」（第一部份）〉，《當代中國研究》，第 3 期（總第 86 期）。
- 何清漣 (2004e) 〈經濟外交的兩張臉孔〉，《Taiwan News 財經文化周刊》，165 期（12 月 23 日），34-37。
- 李昌平 (2002) 《我向總理說實話》。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 岳山 (2002) 〈中國泡沫經濟正在形成〉，《爭鳴》，11 月。
- 林志昇 (2002) 《從中國大陸出逃》。臺北：雍尚數位。
- 周良 (2002a) 〈貪官外逃及其它〉，《議報週刊》，67 期，11 月 11 日 (<http://www.chinaweekly.com/history/gb02110207.htm>)。
- 周良 (2002b) 〈基尼係數與貧富差距〉，《議報週刊》，68 期，11 月 18 日 (<http://www.chinaweekly.com/current/gb11.htm>)。
- 周良 (2004) 〈討伐中國教育部〉，《議報週刊》，172 期。
- 胡少江 (2002) 〈中國的失業統計與國際失業統計有何不同?〉 新世紀網 (<http://www.ncn.org/zwgInfo/da.asp?ID=15763&ad=1/25/2002>)。
- 高長 (2002) 〈由統計數據看中國經濟表現的虛實〉，《經濟前瞻》，84 期，11 月，72-77。
- 高為邦 (2002) 《大陸司法迫害台商實錄》。臺北：星定石文化。
- 凌鋒 (2002) 〈大慶怒火 恐延燒全國〉，《大紀元周報》，3 月 30 日。

- 峻宏 (2002) 〈警惕中國經濟出現災難性下滑的可能〉, 博訊新聞網
 [\(http://66.250.115.216/news/gb/china/2002/09/200209301603.shtml\)](http://66.250.115.216/news/gb/china/2002/09/200209301603.shtml) 。
- 張清溪 (2002) 〈根基腐蝕的中國經濟〉, 《台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 臺北: 現代術研究基金會。
- 張清溪 (2003) 〈中國經濟命在旦夕〉, 《經濟前瞻》, 87 期, 五月, 29-34。
- 張清溪 (2004) 〈為什麼中國經濟難逃崩潰命運〉, 《經濟前瞻》, 95 期, 九月, 27-31。
- 張清溪、鍾谷蘭 (2003) 〈中國經濟制度真相〉, 「危機時代、認識中國」學術研討會, 台中, 2 月 22 日。
- 陳桂棣、春桃 (2004) 《中國農民調查》,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台北: 大地。
- 章家敦 (2002) 《中國即將崩潰》, 侯思嘉、閻紀宇譯, 臺北: 雅言。(原著 Gor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Y.: Random House, 2001)
- 章家敦 (2004) 〈《中國即將崩潰》作者細論崩潰之根源〉, 大紀元新聞網
<http://www.dajiyuan.com/b5/4/9/15/n661418.htm>。
- 傅豐誠 (2003) 〈大陸經濟發展前景樂觀〉, 《經濟前瞻》, 87 期, 五月, 22-27。
- 黃文雄 (李明宗譯) (2000) 《中國投資誠》。台北: 草根。
- 程曉農 (2003a) 〈重新認識中國經濟: 增長的動力與結果當代中國研究〉, 第一期 (總第 80 期)。
- 程曉農 (2003b) 〈中國『三農』問題的制度根源〉, 「中國三農問題國際研討會」, 廿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辦, 紐約市立大學, 12 月 12 日。
- 黑田篤郎 (2002) 《中國製造: 揭開「世界工廠」的真相》, 宋昭儀、李弘元譯。臺北: 經濟新潮社。(原著 Kuroda Atsuo, *Made in China, Japan: Toyo Keizai*, 2001.)
- 楊小凱 (1997) 《當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劉曉波 (2001) 〈朱鎔基善政的又一次擱置: 評農村費改稅的緩行〉, 《民主中國》, 11 月 4 日。
- 鄭竹園 (2001) 〈跨國企業在中國大陸的運作及經濟效果〉, 行政院經建會。
- 鄭義 (2002) 《中國之毀滅: 中國生態緊急報告》。香港: 明鏡。
- Angresano, James, Bo Zhang, and Muhan Zhang, (2002), "China's Rapid Transformation: The Role of FDI." *Glob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Review*, 4(2), 223-42.
- Bai, Chong-En, David D. Li, Yingyi Qian and Yijiang Wang, (1999), "Anonymous Banking and Financial Repression: How Does China's Reform Limit the Government's Predation without Reducing Its Revenue," Mimeo, Stanford University.
- Barro, Robert J., and Rachel McCleary (2003), "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w9682, May 2003.
- Bremner, Brian, et al. (2004), "Headed for a Crises?" *Business Week*, May 3.

- Browne, Andrew (2004), "Can China Land Softly?"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7.
- Buruma, Ian (2001), *Bad Elements: Chinese Rebels from Los Angeles to Beijing*, NY, Random House.
- 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 (2004), *2004 Piracy Study*, July 2004
- Chen, Lingzhu (1997), "China's Strategy and Policy on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ts Configuration: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Stewart, Sally and Anne Carver (eds.), *A Coming of Age: Developments in Sino-Foreign Joint Ventures. Advances in Chinese Industrial Studies*, vol. 5. Greenwich, Conn. and London: JAI Press, 1997; 125-35
- Chen, Michele (2004), "Who are the Unemployed," *Asia Times*, April 1.
- Clifford, Mark L. (2002), "Commentary: Are China's Bank Caught in Quicksand?" *Business Week*, Nov. 25.
- Dolven, Ben, et al. (2004),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China's Other Big Banking Mes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9.
- Drucker, Peter F. (2002), *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 NY, Truman Talley. 《下一個社會》，劉真如譯。臺北：商周。
- Economist (2003), "God, Man and Growth," *Economist*, November 13.
- Economy, Elizabeth C. (2004) *River Runs Black: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Elgin, Ben (2004), "Censorship: Beijing 1, Google 0," *Business Week*, October 11.
- Engardio, Pete, et al. (2004) "The China Price," *Business Week*, December 6.
- Ferguson, Niall (2003), "The World; Why American Outpaces Europe (Clue: The God Factor)," *New York Times* (June 8).
- Gilley, Bruce (2001), "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21.
- Goodman, Peter S. (2002), "Pepsi's China Deal in Ruins,"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 30.
- Gutmann, Ethan (2004), *Losing the New China: 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 Hsieh, David (2002), "Lack Of Trust Dogs China Businesses," *The Straight Times*, Apr. 16.
- Huang, Jr-Tsung, An-Pang Kao and Tsu-Ying Yu (2003), "An Analysis on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among Regions in China," manuscrip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 Hydelman, Jean (2002), "Collision over Red China," *Asia Wise*, Jan. 14.
- Kao, Wei-Pang (2002), *A Real Story of China's Legal System Persecuting Taiwanese Businessman*, Taipei: Jin-Xin.

- Kurtenbach, Elaine (2002), "Enron Bust Awaits China's Businesses," *Associated Press*, March 10.
- Kynge, James (2002), "Pyramid of Power behind Numbers Game," *Financial Times*, Feb. 28.
- Lague, David (2002), "On the Road to Rui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 14, 32-35.
- Lardy, Nicholas R. (1998),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Li, Li and Ching-hsi Chang (2004) "Can FDI Save the Shaking Chinese Economy?"
- Lin, Ji-Sheng (2002), *Escaping from Mainland China*, Taipei: Yung-Shang.
- Liu, Melinda (2002a), "Why China Cooks the Books," *Newsweek*, March 25.
- Liu, Melinda (2002b), "Party Time in Beijing," *Newsweek*, Nov. 25.
- Ng, Linda F. Y. and Chyau Tuan (1997), "Evolving Outward Investment,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nd Technology Change: Implications for Post-1997 Hong Kong,"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8:2, 315-32.
- Ng, Linda F. Y. and Chyau Tuan (2001), "FDI Promotion Policy in China: Governance and Effectiveness," *World Economy*, 24(8), 1051-74.
- Ng, Linda F. Y. and Chyau Tuan (2002), "Building a Favorabl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Evidence for the Facilitation of FDI in China." *World Economy*, 25(8), 1095-1114.
- Ng, Y-K and Xiaokai Yang (1997), "Specialization, Information, and Growth: A Sequen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 257-74.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2),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Paris and Washington, D.C.
- Pei, Changhong (2001), "The Changing Trend of FDI Patterns in China," *Chinese Economy*, 34(1), 89-100.
- Pei, Minxin (2002), "China's Governance Crisi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 Rawski, Thomas G. (2002), "Measuring China's Recent GDP Growth: Where do We Stand?" <http://www.pitt.edu/~tgrawski/papers2002/measuring.pdf>, Aug. 29.
- Sachs, Jeffrey (1994), "Notes on the Life Cycle of State Led Industrialization," *Japan and World Economy*, 8, 153-74.
- Sachs, Jeffrey, Wen Woo and 楊小凱 (1999), 〈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 《楊小凱經濟學文集》 (臺北: 翰蘆, 2001, 頁 102-154)。
- Sachs, Jeffrey and Xiaokai Yang (2000),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framarginal versus Marginal Analysis*. MA: Blackwell.

- Schafer, Sarah (2004), "Microsoft's Cultural Revolution," *Newsweek*, June 21.
- Shenkar, Oded (2004), *The Chinese Century: The Rising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Your Job*.
- Shu, Vivienne (2004), "Legitimacy Crises in China?" in Peter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a* (Routledge).
- Slater, Dan (2002), "Joint Ventures – Ticking Time Bombs for Foreign Companies in China," *Finance Asia*, March 19.
- Studwell, Joe (2002), *The China Dream: The Quest for the Last Great Untapped Market on Earth*, NY, Atlantic Monthly Press. 《中國熱》，齊思賢譯，臺北：時報文化。
- Sun, Haishun (1998),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979-1996*,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 TEF (2000), *A Survey on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Risk in Mainland China*. Taipei: Taiwan Electronics Federation.
- Wasserstrom, Jeffrey N. (2004), "Beijing's New Legitimacy Crisi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68:1 (Dec.), pp. 25-30.
- Wei, Shang-Jin (2000), "Why Does China Attract So Littl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Ito, Takatoshi and Anne O. Krueger (eds.),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NBER-East Asia Seminar on Economics, vol. 9,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39-61.
- Wolf, Charles, Jr. (2002), "Uncertain Time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4.
- Yuen, C. W. (1998), "The Fifth Asian Dragon: Sources of Growth in Guangdong, 1979-1994,"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16:1, 1-11.
- Zhang, Kevin Honglin (2000), "Why Is U.S.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So Small?"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18(1), 82-94.
- Zhang, Kevin Honglin (2001), "What Explains the Boom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Economia Internazionale*, (2001), 54(2), 251-74.